

内生性脱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与合作组织* ——以山西 PH 与河南 HN 两个农民合作社为例

杜洁¹ 宋健² 何慧丽³

(1. 2. 3.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193)

关键词: 农村妇女; 内生性脱贫; 合作组织; 社区公共空间重塑

摘要: 精准脱贫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防止返贫现象发生。当前在农村大量男性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很多农村妇女已成为乡村家庭及其社区的中坚力量,也成为农村脱贫工作中的重要群体。如何激发农村妇女的内生动力成为当前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内生性脱贫的视角对山西省永济市和河南省灵宝市两个由当地农村妇女主导创办的合作组织进行观察后发现:合作组织的形式可以有效地激发农村妇女的内生动力。自发形成的妇女合作组织更倾向于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工作抓手,重塑乡村社区公共文化空间,以此为基础形成可持续、生态化的乡村产业与就业创新模式。可以看到,农村妇女身上蕴藏着的智慧与力量,经过合作组织的形式激发,成为村庄脱贫和社区良性治理的内生动力,这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路径。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20)01-0067-13

Rural Women'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as Their Initiativ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Examples of Two Rural Cooperatives in PH Shannxi and HN Henan

DU Jie¹ SONG Jian² HE Hui-li³

(1. 2. 3.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Key Words: rural women; endogenous poverty alleviation; cooperatives; community public space reconstruction

Abstrac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is to stimulate the internal drive of the poor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prevent the phenomenon of poverty return. In the context of the outflow of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male labor force, many rural women have become the backbone of rural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nd also the important group in the alleviation of rural poverty. How to stimulate rural women's endogenous driv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en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wo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founded by local rural women in Yongji City, Shanxi Province and Lingbao City, Henan Province. It has found that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作者简介: 1. 杜洁(1982-),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乡村建设。2. 宋健(1994-),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组织社会学。3. 何慧丽(1972-),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农民组织化与城乡合作、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生态社会学。同时,感谢山西省永济市青年公益服务中心总干事梁少雄先生协助调研山西合作社案例并提供相关资料;感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志豪、杨光耀,硕士研究生王凯琳、伍晨晨、刘坤等调研团队成员共同完成河南合作社案例访谈。

* 基金项目:本文为“爱故乡高校教学与研究三期项目”(项目编号:SBR/2019/PJ035/a)的阶段性成果。

rural women. Women'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formed spontaneously tend to remold the public cultural space of rural communities with social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so as to form sustainable and ecological rural industry and employment innovation mod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wisdom and strength rural women have been stimulated in the form of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have moved them in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villages and sound community governan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脱贫攻坚工作从广度和深度上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从2013年至2018年,中国农村已累计减贫8239万人,累计减贫幅度达到83.2%,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8年末的1.7%^①。同时从深度上来说,中国扶贫开发的“两不愁、三保障”^②目标中,所提之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保障内容更是超越了经济性脱贫指标。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贫困的深度反思相一致,即贫困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货币获得能力以及消费购买力短缺的问题,更包含社会、文化层面的诸多维度,例如行为能力、文化自信、健康、教育、社会参与等维度^③。脱贫工作取得如此成就,要巩固脱贫成就则更为不易。有专家指出,“精准脱贫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做到稳定脱贫不返贫”^④。

防止返贫的最根本之处在于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精准脱贫工作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关系”^⑤。与完善外部条件的以帮扶工作为主的外生性扶贫工作不同,激发内生动力的内生性脱贫工作强调激发脱贫主体内在的精神力量。有研究者认为,内生性脱贫“是在尊重贫困主体的主体地位前提下,激发贫困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引导其

形成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提高其自身的生产发展能力,依靠自身实现脱贫致富”^⑥。其内容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内生性脱贫需要树立农村贫困人口在脱贫攻坚中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主体地位的获得和主体意识的形成,重要的基础在于通过自组织重建社会网络,进而通过农村村民的自治组织、专业合作社、文化组织等自组织方式,发挥社会网络在重构主体意识、构建社会支持体系、重建乡村秩序、激发潜在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作用^⑦。第二,内生性脱贫的重要内容是精神建设,其根基是文化建设。将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精华结合进行创新激活,对于转变农民观念、提供心理支持、提升精神风貌、激发主动性与创新性具有重要作用^⑧。

在农村脱贫与防止返贫的工作中,农村妇女这个特殊群体不仅是一个需要扶助的问题群体,更是值得重视的具有内生发展动力的群体。农村“留守妇女”群体作为“三留守”(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弱势群体之一受到长期关注^⑨。当前,留守在农村的妇女多从事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家庭照料劳动^⑩。农业女性化现象日益显著^⑪。女性在家庭和社区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她们不仅面临经济资源、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物质匮乏问题,还面临着文化、社会资本、社会权利等方面的复杂困境^⑫。如何激发农村妇女的内生脱贫动力,并借此促进整个农村社区的发展,是一个重要且系统的课题。

①王尚武《大数据“数说”脱贫攻坚重大成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2019年8月13日,http://www.cpad.gov.cn/art/2019/8/13/art_624_101661.html。
②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当前扶贫开发的基本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③习近平《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2月12日),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78页。

近 20 年来,农村基层党建正在逐渐完善,村庄中的专业合作组织、老人互助组织、文化学习组织等社会组织也逐渐增多,村庄的社会空间与治理空间下移。在一些地区,传统农村妇女开始“走出私人领域”^{[14]PP108-119},逐渐进入社区公共空间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在农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中的参与也逐渐增多^{[15]PP53-58 P80}。农村妇女可以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调整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16]PP16-20},并逐渐依托村庄社区“采用优势资产视角以发展新型本土合作经济”^{[17]PP36-47}。其业务内容从产业经营拓展到文化、卫生、养老等社会文化层面,正逐渐探索与开辟出妇女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可能性与社会空间。笔者研究团队的长期乡村调研与参与式研究也发现,近年来,一些农村妇女自发创办合作组织,且参与者也常以妇女为主体。与由外部机构发起的经济扶助项目不同,她们更注重文化活动、社区公共服务等工作内容。例如,本研究中的一些农村妇女自发创办的合作社就以跳舞队、剧团、孝老敬亲活动、社区卫生服务等多种形式带动村民参与,而非以经济产业为首要核心内容。她们“社会-文化-经济”三位一体的自组织工作,呈现出自主性、创新性、活跃性、丰富性等特点,正在形成对外部政策与项目扶助的有效补充模式,对此现象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本文以内生性脱贫的视角,通过对山西省和河南省两个由当地农村妇女主导创办的合作组织案例的观察,拟从社会、文化、经济三个层面分析她们的自组织建设、精神文化建设、经济产业建设,进而探讨激发农村妇女内生动力的有效机制与模式特点。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农村妇女群体,审视她们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对当前研究农村妇女的社会参与、乡村稳定脱贫不返贫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同时,她们的探索模式和实践经验对其他地区贫困妇女的组织化也具有一定的参照和借鉴作用。

二、研究案例简介

山西省永济市 PH 合作联社由 24 个行政村 3865 户社员组成。1998 年,该合作联社以一位本地妇女郑大姐倡导,组织为农民免费提供农业技术培训为发端。2001 年她开始组织妇女跳舞并逐渐开展多种文

化活动和兴趣小组活动,形成了自组织的基础。2003 年郑大姐和一些妇女骨干发起组建“村建理事会”,主动承担起环境卫生治理、修路等多项村庄公共事务。2004 年,她们正式注册农民协会,形成了组织实体。由于乡村人才大量外流,2006 年她们注册成立了农民培训学校,着力吸引、培养返乡青年。2007 年,随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她们注册了 28 个专业合作社,业务范围涉及生态种植养殖、手工艺加工等,同时提供土壤转化、儿童家长教育、手工艺传承、不倒翁学堂(居家养老)服务。2012 年,正式成立了跨越多个行政村范围的 PH 合作联社,提供农资统购、农产品统销、日用品统购、资金互助四项服务。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014 年又注册成立了城市社区消费店,通过在城市社区组织各种老人、儿童、青年人等活动,与城市消费社员建立了稳定的信任关系,将合作社中农民所生产的健康农产品与城市社员对接,使城市消费社员吃上了健康安全的农产品。同时,她们还举办各种生产社员与消费社员交流互动的活动,让双方在互动中了解彼此的生活,建立更加信任互助的关系,重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20 年来,她们不断调整着工作的内容和方式,而始终不变的是对扎根社区的坚持。在她们的工作理念中,合作社首先是在建设一个公共生活的社区,其次才是包含经济功能的组织。

本研究同时观察的第二个案例,来自于与永济市隔黄河相望的河南省灵宝市。河南省灵宝市的 HN 合作联社案例起步于 2012-2013 年,目前包含 5 个行政村 5 个专业合作社的 230 户社员。在引入外部文化资源和企业资源进行传统孝亲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当地农村妇女在各自村庄中创办了业务类型不同的“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合作社。2017 年 7 月,三家合作社共同成立以供销和金融互助服务为主要业务内容的农业联合社,2018 年又加入了两家。同时她们还成立了一个女性成员占大多数的剧社和三个老人日间照料中心,并组织了儿童生态夏令营。2019 年又成立了一个生态农业合作小组,从事发酵床养猪、生态种植等互助合作活动。

本文选取这两个合作社案例,主要基于以下思考:一是二者组织形式的相近。这两个合作社的社

长兼发起人都是本村妇女,合作社骨干也绝大部分为女性,社员中的农村妇女也占大多数。二是由于这两个合作联社处于相近的地理、社会、文化环境中,在社会背景条件上具有参照性。它们的区域位置相近,虽属不同省份但都处于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带,是传统的农作区、中华农耕文化的发祥地。这个区域自然资源相对有限,本地城市工业化发展对乡村带动作用较弱,村庄的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当地农村的青壮年男性人口外出务工比例较高,有大量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在村庄中生活。三是在工作内容上也有很多相似性。她们都是先从文化活动入手,逐渐发掘活跃人才、建立组织联系,进而开展文化服务、卫生服务、教育服务、统购统销、生产合作、资金互助等不同形式的村庄公共服务和合作。限于篇幅,本研究将主要分析山西省永济市的PH合作联社,同时参照比邻的河南省灵宝市的HN合作联社。本文选取第二个合作社案例进行比照的意义在于,探讨PH合作联社20年发展形成的经验是否过于独特,是否在其他条件相似的农村妇女合作组织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规律现象。

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农村妇女合作组织对妇女内生动力的激发作用,分别从社会、文化、经济三个层面进行探讨。

三、社会重联:农村妇女的自组织与社会资源激活

(一) 自主意识与合作需求的激发

有研究指出,“妇女从家庭的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是妇女自主性的成长”^{[4]PP108-119}。与外生性的社会扶助不同,农村妇女的内生自组织是从妇女自主意识的激发与形成开始的。

过去的40年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妇女在从事繁杂的家务劳动之外,还要承担很多以往由男性劳动力负责的农事劳动,形成了“既主内,又主外”的局面。同时,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缺失、生态环境变差、村庄社会支持网络的弱化、资源获得难度加大等问题更是加深了她们的困境。但是,困境和压力本身也可以是动力。在单个妇女可获取社会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走出家庭、寻求互助合作,就成为突破困境的一个重要路径。

山西PH合作联社的发起创办者郑大姐,原本是村里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她的丈夫在当地经营农资生意。在协助售卖农资的过程中,她注意到,在村里没有人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技术培训服务。社会服务的缺失刺激她萌生了组织农民培训的想法。最初她没能从家庭中获得支持,于是转而通过联络其他妇女获得协助并成功进行了组织动员。

郑大姐说“我发现,来买化肥的农民对买什么化肥、需要多少化肥并不清楚。因此我想尝试给农民提供技术培训。我爱人想,卖化肥赚钱就卖化肥赚钱,干吗还搞技术培训,觉得挺麻烦的。1998年的10月份,我就去周边找人商量……利用两个月的课余时间,我跑了周边10个村,联络了80多个妇女。在12月份搞起了第一次技术培训,结果那天出乎意料地来了400多人,那时候冬天特别冷,房间里根本坐不下,后来大家就坐在大路上。这个情景今天回想起来还使人觉得鼓舞。”

从郑大姐的讲述中可以看到,她的丈夫最初并不支持她自掏腰包免费为农民组织技术培训,认为这是“不挣钱”甚至还要自己贴钱的麻烦事,也不是一个普通农资店应该做的工作。这让她意识到,做这件事不能等丈夫出面,而需要自己站出来。于是,在她利用课余时间走乡串户进行劝说动员的过程中,自主意识开始逐渐被激发出来。而能够支持她把这件事做起来的,是她最初联络到的80多个妇女。通过她们的动员,有大批村民前来参加培训,这给了郑大姐坚持下去的信心。值得关注的是,之后她们争取到了市妇联的支持,培训得以继续开展下去,农资店声名鹊起,不仅带动了农资的销售,也使农技培训逐渐稳固下来,并逐渐形成了以她自己所在的村为中心、在周围18个村以6个分店和80户技术培训联系户为纽带的“科教兴农互联网”。网络中的联系户,很多都来自郑大姐最初联络的那些妇女。这个过程也让郑大姐和她的姐妹们开始看到,通过妇女们的团结努力可以做成之前仅靠自己和家庭无法做到的事情。

(二) 舞动互联: 组织建设与妇女自我认知的变化

农村妇女在“抱团取暖”的互助过程中,逐步走出家庭,走向更广阔的联合,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对自身价值和生活的认识。

PH 合作联社的郑大姐和她的姐妹们在成功组织了农业技术培训后,开始一起反思村庄和自己的生活。她介绍说“我比较要好的姐妹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剧情让一位大姐突发感慨‘你看人家城里女人活得多潇洒,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一下班就跳舞,咱们村里女人除了围着灶台转,就是拉扯些东家长西家短的破事,活得真没意思。’我就问‘真要让你们跳舞,你们跳不跳?’没想到几个姐妹异口同声地说‘咋不跳哩,你要能请来老师教咱们,咱们就一起跳。’说干就干,于是我请市里的妇联帮忙,请来了一位幼儿园的舞蹈老师教大家跳舞。我们事先组织了 24 个人,分成 4 个小组,选出了 6 个带头人。”

她们已经意识到,“围着灶台转”和“拉扯东家长西家短的破事”是很没意思的。这也是农村妇女局限于家庭和私人领域的传统社会角色所带来的限制。但是之前仅靠几个人是难以改变这种现状的,现在更多的妇女组织到了一起,她们就有了自主争取更多外部资源、改变自身生活空间的可能性。

不过走出家门并不意味着可以顺利走进公共空间,要改变农村妇女对自我的定位、改变村民对妇女们的认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郑大姐说,妇女们最初一起组织文化活动的时候,一些旁观她们跳舞的人甚至说风凉话,称她们为“女流氓”。她说:“我非常气愤,我们扭个健身秧歌怎么成流氓了!城里人跳舞就叫潇洒,村里人跳就叫流氓?!一定要坚持跳下去,我们要靠行动打掉那些愚昧的思想。几位骨干想尽办法动员村民跳舞,刚开始很多妇女不好意思,就在农户院子里跳,跳熟练了就到巷道里跳,最后到村庄公共空间去跳。没过多久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村的妇女除了年纪比较大的 80% 的人都加入了进来。村庄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之前说风凉话的人也加入进来。一位围观的外村人评价说‘这些女的没有白活’。”

从“女流氓”到“没白活”的评价,可以看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可以在面对外部的性别歧视

与嘲讽的时候以集体的力量去抗衡,也可以让处于其中的个人获得更强的自信心。在组织建设形成的过程中,更自信的妇女们会重新审视自己、审视外部、审视生活的意义,从而逐渐转变自我的认知和社会角色,农村妇女的自主意识与创新精神也在这个获得了自信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增强。

组织的建设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深化。郑大姐介绍说,当跳舞的活动获得了初步认可之后,她们并没有就此满足于闲暇时的自娱自乐,而是开始了更广泛的组织动员。“骨干们 2-3 人一组,开始包片区在两个镇推动,骨干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冬天,下着大雪,大家徒步到各自负责的片区教跳舞,有时回去天都黑了,但大家毫无怨言,还编出了各种顺口溜形容当时的场景‘鞋磨烂,嘴磨破。看的多,跳的少。一人在前教,一人往里推……’”之前疏远淡漠的村民之间的社会联系开始增强,组织联系的范围逐渐扩大。用其中一位文艺骨干的话说“我们起初就是先见面交个朋友,以前两个不同村民小组的新媳妇互相都不认识,在一起跳跳舞、聊聊天,说起这是谁家的媳妇,就都认识了。”在跳舞和聊天的过程中,新的社区氛围和组织空间开始出现,而组织的骨干们也获得了极大的锻炼,很多在 PH 合作联社工作了 20 年并坚持至今的骨干妇女群体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三) 组织关系: 传统亲缘关系的转化与家庭关系的重构

1. 传统亲缘关系的组织转化

在农村,传统亲缘关系是社区组织的基础社会关系。“表亲”“堂亲”等血缘关系的拓展网络经常可以延伸覆盖到很大的范围,而即便是非血缘关系的邻居朋友,为了显示亲密程度,也常常会建立起如“干亲”等类血缘关系。这些由亲戚朋友组成的血缘和类血缘关系构成了村庄中复杂交织的亲缘关系网络。村庄中的妇女们在各种家庭事务的往来过程中,则成为编织与维系社区亲缘关系的重要群体。当需要合作互助时,这个由“七大姑八大姨”组成的亲缘网络就成为她们潜在的社会资源。

当然不是所有的亲缘网络都能转化成有效的组织建设,也不是所有参与广场舞的妇女都能实现自

组织的正式化。PH 合作联社妇女们的组织建设是个渐进的过程,跳舞队最初的组织动员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妯娌之间、姐妹之间的劝说与带动。当跳舞队的文化活动扩散到十几个村庄后,就形成了自组织的基础。可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她们逐渐对跳广场舞进行了反思,认为只是跳舞没什么意思,应该做些更有益的事。她们充分发挥了妇女们爱串门、爱聊天的社交特点,充分发挥“婆婆妈妈”的优势,在一次次走村串户的拉家常中营造着新的舆论氛围。她们自筹资金,组建了为村庄提供卫生、修路等公共服务的“村建理事会”(理事会具体工作会在后面章节介绍)。理事会在村庄整治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于是一些妇女的丈夫、子女等也加入到这个网络中来,组织的范围不断扩大,并进一步正规化。2004年6月,以原来的农资购销网络和妇女活动网络中有稳定联系的农户为基础,她们组建了一个正式的综合性农民协会,并在县民政局顺利注册。之前一起搞活动的姐妹们也正式成为一个共同组织的社员。

PH 合作联社的郑大姐介绍说“咱们这个团队的全职人员里,80%以上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母女的、夫妻的、妯娌的,整个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绕就绕到一个亲戚关系网里去了,这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特色。”她们不仅借用亲戚网络进行组织建设,更借此吸引带动年轻人返回乡村参与村庄的建设。在组织合作社的过程中,农村妇女借助亲戚朋友的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沉淀的社会信任资本,作为公共组织形成的基础。反过来,又由于形成了组织,妇女们原有的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础的村庄亲缘伦理社会关系,经过与外部资源的融合与组织,转化成了从事共同公共事业的业缘关系群体。

2. 家庭关系与组织关系的双重重构

当前,随着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家庭的黏合度也在降低,家庭矛盾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例如婆媳矛盾、不孝敬老人、儿童教育不足、夫妻不合等等。面对这些问题,PH 合作联社的妇女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家庭关系的改善,反对因为妇女走出家庭而造成家庭矛盾的增多。郑大姐说“我们女的

需要的就是家庭和睦了,我们女的提升的目的不是为了离婚。”

对农村妇女来说,妇女不是独立于家庭和社区之外的个体,在强调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的同时,也需要结合她们的家庭进行关系的重建。而家庭关系的重构,需要的不仅是个人的努力,更需要以组织的方式进行变革的集体的力量。

在 PH 合作联社,妇女们社交圈的扩大也构建了共同的公共空间。在这里,在大姐们有意无意地正向引导下,良性的社区舆论氛围逐渐形成。“妇女们在跳舞休息的时候经常会聊起各家的家务事,一些婆媳关系不好、经常吵架的事就会被大家拿出来议论;而有些婆媳关系好的,往往还会一同参加跳舞活动,这也会得到大家的积极评价。时间久了,议论的话题就延伸到家庭生活和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虽然以前大家偶然也议论这些,但是不像现在这样在人多的公共场合;而且那时候也不怕别人说,现在大家跳舞的时候都要表现自己好的一面,再听到别人议论自己就不好意思了……后来,大家还把社区里一些不好的习惯和行为编成小品,在节庆活动时演出,更直接对这些行为形成了舆论压力。”

在这个过程中,受益的不仅是妇女们,男人们也感受到了变化。一个过去经常挨老婆骂的男人说,现在回家,媳妇不骂他了。他说“女的难道天生就爱骂丈夫?她就是活得不痛快嘛!”丈夫和妻子都开始重新看待自己的生活,妻子外出参加活动也不再被嘲讽为不务正业,有的丈夫还会主动承担起饭后洗碗的工作,让妻子能有出去活动的时间。

郑大姐说“女人不是天生就爱东家长西家短,骂老公打孩子,不孝顺公婆。只是长期深陷于锅碗瓢盆而无法提升自我、展示自我,这时一切关系就会不断地累积和恶化。而(我们合作社)工作中的女性同志,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并不是业务,而是家庭关系,如果谁骂自己的老公、打孩子、不孝顺公婆,那就对不起,请离开。原因很简单,如果连自己的家庭关系都处理不好,又怎么能全心全意为社员服好务呢。当然,这条也适用于男性同志。”

可见,脱离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单纯地讨论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是不切实际的。农村妇女通过参加跳舞与合作社获得了家庭内部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在合作组织形成的公共舆论空间引导下,反过来又塑造了她们家庭关系的变化。家庭关系的改善,并不是掩盖矛盾,相反它转化了矛盾。从而,家庭关系不再仅仅是“私人”的事情,它走入了公共空间,与以合作组织为基础的公共社会关系产生联系和互动,形成了家庭关系与组织关系双重的关系重构。随着农村妇女们走出家庭,在她们组织的社区文化活动里,之前属于家庭内部矛盾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问题变成了公共议题。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家中的关系得以对外公开展示,家庭关系的改善成为新的价值观倡导与塑造的工作,也成了合作社共同体新社会关系营建中的一环。家庭的重新弥合也相应地起到了稳定乡村社会、降低乡村基层治理难度的作用。

从以上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妇女们在组织的过程中形成自主意识、激活调动原有社会资源,通过重构个人角色和家庭关系,形成了对村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的重构。类似的转变在河南 HN 合作联社的农村妇女身上也有体现。郑大姐在反思工作的教训时说“想不通在农村做事怎么就这么难……”(反思后)最大的认识就是要没有一个利益共同体,联合不起来,农村根本没出路。也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相互间的诚信,虽然刚开始通过一点小的利益把大家连接起来了,但遭遇一点困难马上就散了。”通过乡村中的实践她认识到,农村要想有所发展就必须建立有效的联结,组织联结的重要基础就是社会信任关系的重新构建。村庄的社会土壤好了,才会生长出健康的社区组织形态,形成可持续的内在发展力量。

四、文化为根:文化自反、社区空间与人力资本提升

从乡村文化入手推动乡村文化复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8]PP91-95}。有活力的合作社一定有着合作的文化根基、文化理念^{[9]PP127-136}。一般意义上文化作为“无利可图”甚至还要贴钱的领域,经常处于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的位置。或者在一些经济组织的建设中,文化往往会被视为一项辅助经济活动的

工作而成为“可有可无”的存在。但是在山西与河南这两个合作社案例中,将文化放在经济之前,以文化活动引领组织建设,是她们工作的重要特色。

(一)文化学习与自我反思

把“七大姑八大姨”聚到一起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有效的组织构建,要想达到这一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学习”。通过学习让组织成员获得自我教育、自我反思、自我成长的能力并建立自信和自主意识。这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乡村新的文化的建设过程。PH 合作联社的妇女们,在最初组织农业技术培训时就在学习,此后她们在跳舞、开展村庄公共服务、组织生产合作等工作的 20 年中,团队的自我学习从未间断。河南 HN 合作联社的妇女们,在成立之初就多次到 PH 合作联社参观学习,她们还组织“道德讲堂”等多种形式的学习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对乡村传统文化、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等都进行了自反式的重新认识。

PH 合作联社的大姐们,在跳舞时的一次次纠纷中体会到,要让大家“懂道理,长见识”。她们从电视中的大学生辩论赛里找到灵感,认为“话不说不清,理不辩不明”。通过组织农村妇女辩论赛,她们把之前“私人恩怨”式的争吵转化为公开的辩论论题。她们选取身边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作为题目,如“婆媳关系不好,婆婆责任大还是媳妇责任大”“生男好还是生女好”“妇女是要融入市场经济大潮还是做贤妻良母”等等。

根据她们的回忆“一开始,辩论的时候总会吵得不可开交,但也使大家渐渐感觉到自己知识水平不足。看到电视里大学生们辩论时滔滔不绝,但轮到自己时道理就在嘴边却说不出。”于是,妇女们自发商议要组织起来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几位积极分子还把自家的屋子腾出来免费给大家当学习教室。她们把参加学习的妇女分成几个小组,每天晚上干完家里活后便集中到一起读书讨论,学习和讨论的话题十分宽泛。经过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几项常规的课程内容:家庭教育讨论、政策法规学习、生产技术交流。她们学习的形式也很灵活,除了围坐在一起的学习讨论,还会把握各种机会外出参观、听讲座,这极大地拓宽了妇女们的视野和知识

面,以至于 PH 当地村民称合作联社的骨干们为“女将军”。

当然,也遇到过有妇女不愿意参加学习的情况。这也是当前很多扶贫或社会工作机构遇到的问题,在村里组织农民学习的时候,农民并不是很愿意来,有时候甚至要发钱才可以组织到人。郑大姐回忆说,曾经遇到在学习的时候有妇女问来学习给不给钱的情况。对此,“我说你要钱干什么?她说我孩子星期天要回来拿钱,我说你孩子要钱干什么?在哪里上学?她说我孩子已经上高中了,我说你供孩子上学干吗?她就提出来,孩子上完大学就能挣大钱。我就问她,你孩子从小到大花多少钱,她说起码要花 10 多万。我说你孩子上学,要 10 多年的时间,还要花 10 多万。你觉得孩子上学是有出息的,我们今天组织你到这里来,你给我交学费才行,凭什么要给你钱?再说又不是你在地里干活我把你叫来学习,明明现在是农闲时间,冬天你在家做什么?她说没事、聊天。我说你没事的时间学习有什么不好?假如从现在开始学习,再学 10 多年你想想你是什么样子?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通过这样的方式,郑大姐把组织学习这件事情转化为每个参与者自己的事情,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之前妇女的关注点在于怎样通过教育提升孩子、改善家庭,那个过程中“自我”是没有的,即使有空闲时间也只是“没事”和“聊天”而已。而现在变成了通过学习改变与提升自己,自己不再是一个“没事”的空白。这样,就把文化学习的外在文化话语,转变为参与者内在的自我提升意识。这些活动在无形之中构成了对传统农村家庭妇女意识的反思,也通过辩论和旁听形成了组织成员思想认识上的统一。这种文化上的建设和统一,是保证合作组织在村庄中开展工作的根基。

(二) 文化引领: 构建农村妇女可参与的社区公共空间

有研究指出,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最艰难的“不是参与经济,而是参与政治”^{[4]PP108-119}。村庄中的社区公共事务,传统上是以男性为主在参与。妇女们的角色更多地被局限在家庭或家族内部事务中。对于 PH 的农村妇女来说,正是在跳舞等文化活动和

长期的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她们才突破家庭局限,形成了“社区建设”的概念,开始了进入村庄公共领域的探索。她们觉得不能只是指望政府来做事,而应该用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的空间。她们由于常年组织文化活动,已经培育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2003 年,她们以居住的 7 个巷道为单位,每个巷道推举出了 4 位代表,由这 28 位代表组成了本村的“村建理事会”。理事会通过发传单等方式进行宣传动员,充分发动村民参与。然后以每家分片包干的方式,负责整理自家门前的路,再由理事会和文化骨干们一起修整村口的路。前后花了 70 多天的时间,这个妇女们自发组织起来的村建理事会就解决了全村的道路硬化和修排水渠的问题,总花费加起来只用了 3 万多元。随后,针对村庄卫生问题,她们还发动村庄老年人组建了“义务卫生监督队”,监督乱丢垃圾的问题。采用收“1 元垃圾费”的方式,挨家挨户做教育动员工作,并发动舆论进行谴责,很快就低成本地解决了村庄垃圾随处乱倒的问题。

后起之秀河南 HN 合作联社的妇女们,还组建了一个 HN 剧社,利用农闲时间自费编写、演出地方剧目,将自己身边的事情编进剧中,由身边的人当演员。通过演出,很多之前说话都会不好意思的妇女越来越自信,并在筹备一台戏的过程中磨炼了组织、沟通、策划、筹款等诸多能力,还拓展了社会交往范围。她们虽然表演并不专业、剧本并不完善、舞台并不精美,但是经过一次又一次地给本地农民演出,吸引了大量本村本乡的观众,经常出现村民打着伞冒雨观看演出的场面。演员们越来越自信,观众们观看的也不仅仅是剧目本身,而是参加演出的自家闺女、自家婆娘,并以戏剧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

合作社通过组织文化活动,提升了妇女的自主意识与责任感,扎实了组织建设、锻炼了行动能力,还在村庄中开辟出正式政治体制之外的社会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妇女们逐步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价值和主体意识,构建了低成本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效机制。

(三) 焕新乡村传统文化,激活留守的人力资本
当前传统文化中很多内容重新被强调,例如“孝”、家庭伦理等,都因应着当前农村的家庭碎片

化、流动化、空心化等社会问题以及文化上的话语缺失^{[20]PP95-116}。农村妇女作为传统孝文化中“婆-媳”关系矛盾双方统一体,在新时代对孝亲文化进行着阐释与重构,具有特别的社会性别意义。在研究观察中发现,山西和河南合作社案例组织的孝老机构中,参与的老人往往以女性居多,且参与传统手工艺活动的老人也更多是女性。作为婆婆的留守老人和作为媳妇的留守妇女,在碎片化的农村留守空间中,通过对孝老敬亲文化的共同建构,不仅起到了重新弥合村庄社区的作用,更通过互相的认同与尊敬形成了对农村女性自身的肯定与尊重,也通过激发老人作为传统知识专家的重要价值与力量,提高了留守者人力资源的价值。

PH 合作联社的妇女们不仅组织了孝老敬亲的短期活动,还在村庄中成立了互助养老的公益机构,命名为“不倒翁学堂”。“不倒翁”之意在于老人不是倒下的累赘,而是智慧的宝藏。一方面,它是一个村庄中的老人日间照料机构。在这里,“在村委的同意下、老人子女的支持下,12-15 位 75 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聚集在常年在外的农户家里进行不出村的互助养老(房子是租的,装修布置得很舒适),而老人的子女们只需要支付每月 200 元的成本,还可以用等额实物抵换,但每天早晚要接送老人,每月还要为所有的老人们做顿饭。”在这里,老人的子女不是只交钱就可以了,还必须要参与服务老人的事情。通过建立这样的有效联结,加强了老人与子女之间的互动和关系改善。

另一方面,“不倒翁学堂”更重要的是“学堂”二字。她们强调这里不是养老院,“老人们在一起不是吃吃饭、晒晒太阳就完事了,还得学习和教学,这才是核心!……老人们要识字、唱歌、跳舞、练气功、剪纸绣花编织、种菜等,同时要将自己的经历与技能分享给村里的儿童和年轻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老人在继续学习的过程中与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重建联系,又通过教授传统手工艺让自己的知识经验重新焕发价值。这也让村里人重新认识到老年人的价值,使“孝敬老人”获得了更新的具体的内涵。

类似地,河南的 HN 合作联社也以“兼善堂”“上善堂”等名称组织了老年人服务机构。在那里,“老

人参加完活动之后,心情就会变得特别好,不仅学到了很多,而且有机会聚在一起,大家一起聊天,可以打发无聊的生活。因为我们当时要弘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里面包含手工艺。为什么找老人,因为这些手工艺我们都不会,在我们这里都快要失传了。所以,想要让老人在一起,想要让老人老有所为。(后来发生的改变是)老人在这里捏花膜,他们就在这里捏,我们作为平台可以把这些花膜销售出去,卖给消费者。(交易额)每次都不同,一个花膜原来 300 元,后来因为成本太高做不出来,就提高到 400 元,大的就 1600 元”。

农村妇女组织的这些敬老服务工作,是发掘“留守”老人内生力量的重要工作,并逐渐显现出经济效果。一方面是对孝与善的传递,能够为老人提供心理上的支持与安慰;另一方面,也是对“留守老人”这个群体所蕴藏的重要文化价值、人力资源价值的发掘。留守老人不再是只能蹲在墙根晒太阳的等死的“残值”劳动力,相反,当合作社妇女们的“红娘手工艺”与老人的传统技艺相结合创新出乡村第三产业的文创产品时,就形成了巨大的价值增值空间。同时,老人们所掌握的传统农耕技术,在化肥农药耕种中往往被认为是过时无用的,但在生态农业的创新中却变成了不可多得的知识宝库。通过聚在一起聊天、做手工艺、回忆传统儿歌谚语等,老人们不但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意义,也形成了对村庄传统智慧的传承。

上述分析可见,在农村妇女合作组织中,文化建设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化先行”并不是她们从一开始就清楚的明确路线选择。坚持文化活动引领性的重要作用来自于对一次次教训的总结。PH 合作联社曾经历了三次经济项目的失败,这导致了一些社员的退出。郑大姐在痛定思痛的反思后指出“我们千万别把带领大家致富作为目标和口号。”她进而更加关注文化活动的组织,例如组织村里的妇女跳舞等。经济项目的失败虽然流失了一些参与者,但由于文化领域合作的持续开展,已经建立起来的妇女联系和参与并未完全断绝。并且,随着跳舞活动、合作购销业务及手工艺合作向周围几十个村庄的扩展,从整体上看,协会以其他领域的合作联

系起来的农户范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从而保障协会最终渡过了这次“难关”。

同时,PH合作联社与HN合作联社都是在组织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发掘和培养出了很多妇女骨干,为进一步发挥农村妇女的创造精神和主动性奠定了人才基础。郑大姐指出PH合作联社的经验在于“我们经济目标与公共服务的这些文化活动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我们攒人不攒钱”。可以说,文化建设是个“攒人”的工作,而人作为脱贫的主体,才是内生性脱贫的核心力量。

五、生态为本:农村妇女的乡村创业就业适宜业态

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不是暂时提供了就业岗位或者短期形成某一特色种养殖产业,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特别是对于农村妇女来说,更需要有适合她们性别特点的业态,才能激发其内在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村妇女们的合作社并不是只做文化活动和公益服务,她们同时也要进行生产、经营以及金融互助等经济类活动。适宜业态的形成,正是妇女们组织起来之后,通过自主参与和学习,对社会资源与文化资源进行整合调动,在一次次的讨论、尝试、失败中逐步探索出来的。本文通过对两个案例的研究,对其当前的阶段性业态的选择现状进行描述和特点归纳,并初步分析了这样的业态怎样体现了农村女性的性别特点。

(一) 生态化农业生产转型

在本文调研的这两个案例中,在合作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方面,她们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生态化的农业种养殖,会不同程度地注意到土壤的保护。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由于保护孩子的母性本能等原因,更容易倾向于保护环境生态,更愿意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21]PP45-50 [22]PP12-15 P109}。女性对本地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更高,当妈妈的女性比没孩子的女性对环境的关心水平更高^{[23]PP586-593}。

在PH合作联社,已经有3865个农户会员在8万亩土地上转向多元生态种植,对接了周边城市的8100个生态产品消费者家庭。但对郑大姐和她的姐妹们来说,“生态”不仅仅代表新的产业类型和挣钱方式,而应该是生态化的家园建设方式、生态化的生活方式。PH合作联社要求“凡是社员均需转化

1-5亩土地,采用不使用化肥农药的生态生产方式。土壤转化首先是促使社员关心自己家庭的食品安全问题,让自己吃上健康安全的农产品,其次才是为城市社员提供生态健康的农产品。但更重要的是,让社员在有一定经济收益基础上热爱养育我们的大自然,保护我们生活中的土壤、水和空气等资源,为全社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会引导社员将家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堆肥,茅厕粪源或鸡、羊、猪、牛等动物粪便经技术处理后使用,秸秆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培育蚯蚓疏松土壤,也会从外部统一购买生物菌肥、有机肥等替代化肥,会通过技术培训、座谈会、入户等方式传播生态防虫治虫方法。”

同时,她们强调不能以生态产品可能卖高价的前期来引导农民做生态化转型,生态的生活观念才更重要。郑大姐说“我觉得观念导入非常重要,我们集中很多堆肥,集中大家清理垃圾,都是影响老百姓的观念。……总有明白的农民,土地是种庄稼的源头,如果我们的土地都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它还有希望吗?……先引导农民不是为多卖钱才去做有机农业。不把这个观念导入过来的话,你有(投入)多少钱能贴(赔)多少钱。”

在河南的HN合作联社,生态柿子醋、生态化的蔬菜水果种植、生态化发酵床养殖等都已经陆续开展起来并取得一定成效。她们也同样以健康身心的生活态度进行生态产品的经营。HN合作联社的张阿姨说“我们合作社最初的一个宗旨,就是要做健康的食材,有健康的心灵。通过我们这几个人做好,让别人看见我们,能带领大家向善,一起发展。”

(二) 三产融合式产业创新

当前,生态文明新时代对农村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三产融合的生态产业成为供给侧改革后农业发展的整体调整方向。对此,农村妇女从内在特点上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一方面,在“农业女性化”背景下,“既主内,又主外”的农村妇女更容易将家人健康生活的目标与经济收入目标结合考虑,探寻最可持续的生态生活模式,从而形成“三生融合”的内生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很多农村妇女对家务、手工艺熟悉,有利于在农副加工、民宿、农家餐厅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女性的感性思维和文化审美

倾向更适于将文化创意引入农业,推动形成农业三产化的发展创新空间。

在山西 PH 合作联社,妇女们除了进行土壤改造、生态种养殖以外,自 2004 年开始,她们就已经发掘社区内剪纸、绣花、纺线、织布的传统手工艺,开发文创产业,创办了“红娘手工艺”合作社。从种植生态棉花到纺线织布,再到制成各种成品销售到香港、加拿大等地,逐渐摸索出了丰富的经验。

乡村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并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产业项目。据“红娘手工艺”负责人牛大姐回忆,最初只是妇女们出于共同的兴趣一起做剪纸、布艺,“当时就是自己感兴趣做着好玩,也不卖”。后来得到了外面人的欣赏,并获得了省里的一个奖,这才使大家意识到,过去的这些老手工艺具有被忽略的价值。“我们就想,这里过去有土布,织布纺线的技术都有,都是这里最传统的东西。但现在老人们年纪大了,年轻人都不会,慢慢就会失传了。……于是,我们开始拜访当地的老人们,请她们说怎么染线、浆线,怎么煮线。11 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这时已有 27 个感兴趣的妇女加入进来了。后来我们又请了一个当时已经 84 岁的老人教我们做小物件,她什么都会做,像虎头鞋啊……后来又请了 4 个老人,我们管她们叫‘巧巧手’。有个老人,只要天空有一只鸟飞过,就可以画出来。”

在发掘传统手工艺的过程中,村里的老年妇女和中青年女性由共同的文化兴趣结合起来。在这样的文化活动中,手工艺兴趣小组也慢慢发育起来了。之后逐渐有城里人感兴趣,她们才开始对外承接订单,形成手工艺品加工的合作业务。到 2005 年底时,逐渐形成了纺织组、织布组、缝纫组、绣花组 4 个小组。共有 200 户社员入股,在对内部制度加以规范和完善后,在手工艺加工项目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红娘手工艺合作社。

发展至今,她们已经建设了豆腐、蒸馍、打铁、木工、酿醋、香油、编织、纺线、织布、绣花、榨油、磨面等 12 个手工屋,既可以生产安全健康的农产品,也可成为城市社员参观以及儿童乡土教育的重要平台。在她们的认识中,“乡村的手工艺不仅是文化,也是在地循环经济的核心”。

河南的 HN 合作联社也逐步开展了生态柿子醋、葡萄酒加工、发酵床生态养殖业、乡村夏令营等项目。生态农业与三产融合农业体现出农业的多功能性,更重新定义了农村女性的劳动价值和社会位置。

(三) 生活、生态、生计的融合: 培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土壤

农村妇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家庭的紧密联结。因此,能与生活形成更好融合的产业形态或就业方式,才更适合她们。在本文的两个合作社案例中,她们的生态产业创业模式都体现出了生活、生态、生计“三生融合”的特征。

首先是生活与生态的融合。她们选择生态农业主要是出于生活的考虑。PH 合作联社在开展生态农业生产之前,先做的一项工作是建设“生态家园”。2004 年,她们将原来由组织妇女跳舞、捡垃圾、修路而发展起来的“村建理事会”改为“生态家园”理事会,开始通过文化、卫生等多种活动推广生态理念。农民作为每天都要和土壤、水、自然作物打交道的人,对于自然生态的问题是很容易认识 and 理解的。阻碍他们转型生态种植的因素,主要是生态种植和经济收入之间的矛盾。很多农民担心不用化肥农药会造成产量降低、收入减少。PH 合作联社在进行动员的时候,却故意不去回应收入的问题。因为她们发现,不能一开始就强调生态农业的经济效益,不能以生态农产品可以卖更高价格的前景来进行动员,那会带来很大的误导。而真正具有可持续性的动员方式是进行自然生态的教育,只要教育和组织工作做到位了,经济上的改善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次是生活与生计的融合。用 PH 合作联社郑大姐的话说,她们的目标是“生活第一,经济第二”。这一点在她们发展“红娘手工艺”业务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随着消费市场的打开,她们生产的手工艺品、土布制品等产品的需求量开始增大。但是面对这样的挣钱好时机,她们却选择了控制产量,也不在淘宝等电商平台上扩大销售。其原因是,合作社中从事手工艺生产的有很多是老人,接单太多会导致工作强度太大,不利于老人的健康。同时,合作社的另一个目的是发掘和保护本地的民间手工艺,她们认为,若订单太多会挤占年轻成员们向老人们学

习的时间。所以,生计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更美好,如果由于追求发展而带来了健康问题、影响学习问题等,那么这时候产业的规模就是需要控制的。

河南 HN 合作联社的一位主要发起人张阿姨的柿子醋合作社,也是基于相似的理念进行生态农产品加工。她从关注个人健康入手,进而强调健康的食材与健康的生活。她现在所采用的柿子醋制作方法是祖上传下来的,家里老人还会做,她便跟着学习。合作社现有一个制醋作坊,包括两间房屋以及屋前的一小片空地。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不足与农村传统流传下来的“土法”养生保健知识技艺相结合,就形成了在当前城乡生态养生市场上具有竞争性的“柿子醋”养生产品。这种生态化的农副产品经营是劳动密集型的,从原料收购、加工、生产到销售环节较多,又内在地形成了合作化和组织化的需求。

六、初步结论

本文所研究的两个农村妇女主导创办的合作社案例,体现出的个案特点尚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农村妇女的普遍状况,但是其所显现出来的可能性空间,值得在乡村振兴深入推进过程中给予高度重视,她们探索出的模式和积累的经验也会对其他贫困地区妇女的组织化和内生性主体建设有所启发。通过本文分析可以看到,农村妇女在乡村社区中不再只是需要关怀与扶助的弱势群体,更是需要理解与支持的动力群体。合作起来形成互助组织是激发农村妇女内生性动力的重要机制。从社会性别角度分析妇女的内生动力,仅仅从形式上成立合作组织的外壳是不够的,更需要借助组织的合作力量,内在地形成适宜女性生活与发展的内涵与灵魂。

上文案例分析显示,农村妇女主导创办的合作组织经过多年的动态发展,阶段性地形成了一些适合女性需要的工作内涵,进而形成促进女性内在动力激发和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可以初步做以下概括。

第一,从社会层面来说,女性的敏感性、柔韧性和社交特长使得她们具有处理错综复杂的村庄矛盾关系的优势。通过这一优势,她们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从家庭出发进入社区公共空间,对村庄蕴藏的亲缘网络进行再组织化,重建私人领域与村庄公共领

域的连接,重建村庄内的社会信任网络与社会支持网络,这是社区内生性稳定发展的重要土壤。

第二,从文化层面上来说,对农村女性来讲,进入文化空间相对容易一些。农村妇女通过发起组织文化教育活动,可在村庄中构建新的公共空间,探索农村妇女社会参与的创新形式。这个空间既成为妇女们进行学习和自反性主体意识提升的重要基础,也成为村庄中进行再整合、构建新价值观、凝聚人心、焕发内在民力的重要场域。文化公共空间建设与女性内在具有的对养老、教育的关注相结合,激发出她们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延展出将社会服务、社区发展与文化产业结合的创新发展空间。

第三,从经济层面来说,女性与家庭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其对可以将生活、生态、生计有机结合的产业业态有更强的需求。农村妇女在合作社中从事多样化的三产融合生态农业,能够融合“三生”需要,比旧有的农业生产脱贫方式更具优势。同时,农村妇女对生态环境与健康的天然关注,内在地契合了生态文明新时代倡导的绿色生产方式变革,也提高了妇女在乡村生态产业发展中的自主参与度。生态化农业产业要求更高的协作和传统农耕知识,这是妇女合作组织所具备的优势,也形成了保障她们能够可持续地发挥内生性脱贫作用的创业和就业特色模式。

综上所述,农村妇女群体蕴藏着的智慧与力量,经过适当开发,可以成为村庄脱贫和社区良性治理的内生动力,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研究的两个案例中的农村妇女组织,以多种形式带动村民参与,在村庄社区中营造出新的公共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妇女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转变,即从为改善家庭生计服务于内部私人领域的传统女性,向担当村庄公共发展事务的现代女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增强了农村妇女的主体意识,推动了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的激发以及社区的重塑,成为巩固村庄脱贫成果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从政策建议的角度来说,激发农村妇女内生动力的核心机制是带有文化和生态视角的、具有自我学习和反思能力的自组织建设。从内生性脱贫工作的视角分析,为了保证脱贫工作不返贫、促进乡村振兴工作进一步深化,可以在未来工作中对农村妇女合

作组织建设给予重视和支持。农村妇女自组织建设同时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需要在基层党委的领导下,关心妇女需求、支持妇女创新创业、倡导妇女学习提升。其次,与建立合作组织同等重要的是培育过程。对农村妇女的培育,除了知识技术的提供外,更重要且关键的是自信心、自主意识的培育。再次,合作社工作中,因应脱贫和发展的需要往往会急于求成地将短期经济效益放在首要位置,但这将造成长期失衡和不可持续。所以,需要注意将经济与社会、文化层面的工作结合起来,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妇女从自

我意识、性别意识、责任意识到受教育水平、经济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已经获得显著提升,此前大量的政府扶贫项目、社会工作项目的投入也已经逐渐在乡村的土壤中积累下诸多营养。妇女内生力量的发展正如新禾破土,在探索中成长。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辛酸、挫折、纠结、调整、创新都值得我们认真呵护与研究。本文的研究还很初步,仅仅对文中案例的多年发展历程做了冰山一角的描摹,关于农村妇女在自组织过程中更复杂的社会性别张力、更多元的主体塑造过程以及她们在应对各种问题与困难中的动态发展变化等问题,都值得更长时间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王文雅.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内生动力研究[J]. 决策咨询 2018 (2).
- [2]李小云. 脱贫摘帽重在不返贫[N]. 人民日报 2018-08-26.
- [3]王莹、孙超. 基于乡村振兴视野下内生脱贫激励机制研究[J].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8).
- [4]唐康、李勇、卿萍秀、杨红新. 贫困村脱贫内生动力的培育路径——基于典型村庄的调查与分析[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9, 30(11).
- [5]袁金辉. 激发精准脱贫的内生动力[N]. 中国经济时报 2017-12-28.
- [6]江红芳. 多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思考——基于发挥贫困主体脱贫内生动力的视角[J]. 新疆社科论坛 2016 (3).
- [7]江立华、肖慧敏. 心理健康与精准扶贫: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的新途径[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6(05).
- [8]王林玉. 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内生动力[J]. 理论与当代 2017 (4).
- [9]吴惠芳、饶静. 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综述[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6(2).
- [10]李实. 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基于山西若干样本村的实证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3).
- [11]陈方.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村妇女发展[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9, 21(3).
- [12]梁栋、吴惠芳. 农业女性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对农村性别关系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四川及山西三省的村庄实地调研[J]. 妇女研究论丛 2017 (6).
- [13]刘欣. 近40年来国内妇女贫困研究综述[J]. 妇女研究论丛 2015 (1).
- [14]许敏敏. 走出私人领域——从农村妇女在家庭工厂中的作用看妇女地位[J]. 社会学研究 2002 (1).
- [15]苑鹏、曹海清. 妇女专业合作社发展初探——以山东省潍坊地区两家妇女专业合作社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01 (4).
- [16]叶敬忠. 留守妇女与新农村建设[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9, 21(3).
- [17]闫红红、郭燕平、古学斌. 合作经济、集体劳动与农村妇女——一个华南村落的乡村旅舍实践案例. 妇女研究论丛 2017 (6).
- [18]刘忱.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J]. 中国领导科学 2018 (2).
- [19]何慧丽、杨光耀. 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种典型的本土化社会企业[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6(3).
- [20]贺照田. 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 如何可能? [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8 (6).
- [21]王云霞. 环境正义中的女性: 另类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6, 32(2).
- [22]赵媛媛、李建珊. 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正义”之比较研究[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6 (4).
- [23]T. Jean Blocker and Douglas Lee Eckberg. Environmental Issues as Women's Issues: General Concerns and Local Hazard[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89 (3).

责任编辑: 含章